

战斗在天津

革命回忆录选编之一

6.34

0

战斗在天门

革命回忆录选编之一

天门县史志通讯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战斗在天津

革命回忆录选编之一

6.34

0

序 言

郑绍文

天门县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把征集到的老同志们的回忆录的一部分编成了一个集子——《战斗在天门》，并嘱我为之写点什么。回想起战争年代我在天门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回想起与我们有过共同的欢乐和共同的痛苦的天门人民，我感到我有责任完成县委交给我的这一任务。

在鄂中，无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从洪湖向北发展，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从京山向南发展，天门都是我们巩固的后方和前进的走廊。正因如此，这里的斗争就更为艰巨、更为残酷，这里的人民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就更为突出，所作的牺牲就更为重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家墩战斗”、“瓦庙集战斗”，抗日战争的“曾家湾战斗”、“吴家新场战斗”等著名战斗，都是说明天门县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天门人民对革命战争所作的贡献的例子。现在，通过老同志们的回忆追述，参考有关文件档案，把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天门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革命战争所起的作用记录下来并整理成册，作为老一代的一笔“遗产”贡献出来，向新一代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们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使他们了解革命事业创业的艰难，激发他们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的热情，奋发图强，献身祖国，完成党交给这一代人的更为艰巨、更为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县委的这一工作，对于建设祖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疑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和我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同志，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流尽了他们最后的一滴鲜血，长眠在天门这块土地上了，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心里难过。多少年来，我总希望能把他们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用以寄托我们这些幸存者对他们的敬意与哀思并传之后代。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天门同志们的这项工作，了却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桩心愿。以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最后，并以此向战争时期与我们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天门父老和战友们致诚挚的敬意与亲切的问候。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于北京

目 录

(以文中所涉时间先后为序)

- 一、回忆天门的二三事……………李国良(1)
- 二、皂市米厂与汤池训练班……………许子威(7)
- 三、竹桥战斗……………谢 威(12)
- 四、开辟天西——访问刘少卿同志记录(节录)……………(23)
- 五、天京潜的草创时期…………… 谢 威(28)
- 六、段家岭反伏击战…………… 刘友海(55)
- 七、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天京潜…………… 陈建新(60)
- 八、吴家新场战斗……………(69)
- 九、重返天京潜…………… 谢 威(78)
- 十、解放天京潜…………… 邹毕兆(83)

回忆天门的二三事

李 国 良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我已着手撰写回忆录。已脱稿十几篇，先后送到了北京博物馆，手中的几篇还在整理，没有现成的文字资料送给家乡。现在，只能谈谈天门的二三事。

成立天潜县委会

一九二六年夏秋，正当北伐军向湖北挺进之际。为了加强党对全省工作的统一领导，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原来的汉口、武昌两地委改属中共湖北区委会直接领导，并由董必武、陈潭秋分别兼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和中共武昌地委书记。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必武、陈潭秋两同志委派许继得、陈义干等十三位同志，来到天门县李市乡仙人桥的田场寺，从事党的工作。附近有两个小湾：桥头只有六户人家，桥后也只有八户，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没有一户地主，加上这个地方与潜江县的竹根滩毗邻。那里的党组织建立的较早，群众基础很好，对这里的影响很大。

许继得、陈义干等同志到这里后，首先找“泥巴腿子”

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使大家懂得“穷人是怎样穷的？”不是“八字”、“命运”不好，而是受了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农民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封建地主。通过阶级教育和革命实践活动，大家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很多同志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一九二七年初，发展了李传炳（木工）、齐有勋（学生）、张学贤（小学教员）和王大富等四个党员，李传炳同志为第一任党小组长。

在工作中，同志们感到：黑流渡与张截港均在襄河线上，经常发生工作关系，而两地不属一个县领导，为了有利工作，经请示上级，于一九二七年春，成立了天潜县委会。其领导成员是：县委书记许继得（住在黑流渡朱天兴大药店家里办公），副书记李传炳（住在向和兴大房杂货店里办公），县工会、妇协会、青年团、土地委员会的住址都在黑流渡堤街。

县委机关建立后，各项工作抓的很紧，形势发展很快，党的建设加强了，七月八日，在我家门前禾场上，第二批新党员：李国太、李国良、张家佑、张家声、张家彦、张学宽、张学元等七位同志举行了入党宣誓，我还记得“誓词”的大意是“要忠于革命忠于党，严格遵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党员人数增加以后，党的区委会相继成立。全县设六个区：黑流区、张港区、蒋场区、渔薪区、陈场区、灰市区。

黑流区委会在黑流渡街上龙王庙办公，区委书记周良才，区长陈义干（兼），赤卫大队长李国良。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兼任秘密交通员，经常送信到蒋场、渔薪、毛嘴，襄南的信件，从黑流渡划小船过河，笔直走到竹根滩，交给

粮行里的廖尉云(我地下交通员)，他打了收条后才返回。“那时，来回一趟要走几十里，工作虽辛苦，心里还是热呼呼的啊！

李市乡的秋收暴动

我入党后不久，汪精卫与蒋介石鼻通一气，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实行国共分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又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天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起义大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时制定了以鄂南为中心的秋收起义计划，计划中明确指出：“党必须坚决领导土地革命，领导工农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为了便于指挥暴动，省委将全省划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等七个区。其中，鄂中区包括：天门、京山、应城、汉川、沔阳、潜江、公安、石首、监利、荆门、江陵十一个县。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在天潜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我在自己的家乡李市乡举起了暴动大旗，发动农民兄弟，惩办土豪劣绅。八月底的一天，我在拐家桥带领着三百多农民兄弟，挥着大刀梭标，喊着口号，游行示威。经过戴家台、蒋家

台、郑家港、司家台、陈家潭口的前湾中湾后湾向黑流渡进军。参加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多，最后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人，并在宋家塔杀了一个大地主。就在这次战斗中，我被选为赤卫队大队长。

我们赤卫队愈战愈强，不仅积极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而且多次粉碎敌人的装武骚扰。有一次，我们发现反动武装保安团有七十多人，从岳口镇出来了，于是，由四个赤卫队员骑着四匹大马，高喊着口号，象冲下山的猛虎，向敌人方向冲杀过去，后面紧跟着数十名赤卫队员和广大群众，大伙儿一边打锣，一边放土铳、鸟枪，一边在铁桶里放爆竹。敌人听到“辟拍、辟拍”和“轰隆、轰隆”的响声，以为我们有机枪、大炮，吓得丧魂落魄，节节败退。为了取得全胜，我又指挥群众由郑家港迂回。分三路向马家榨的东边、毕家滩的西面、方家缺口的正面包抄敌人。敌人狼狈逃窜，我们缴获敌人的步枪四支，子弹两千多发。从此，我们乡赤卫队有了枪支和弹药，大家喜气洋洋，斗志更旺。县委开会表扬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突击战，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

趁胜利的大好时机，我们又巧妙地在戴家台后面，包围了一家酒店。赤卫队员一冲进去，几个逃跑了的大地主都躲藏在这里，当场捉获了罪大恶极的戴国榜、戴国向、戴国珍，就地进行了镇压。接着在祁家台将大地主张学富的母亲也捉拿归案。她家除了收租外，还一贯放高利贷，按一天十分之一收息钱，残酷地剥削农民，农民十分痛恨，将这个地主婆杀在湾里的后坡上。这些革命行动，大长了农民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革命高潮，一浪胜过一浪。

火牛战术攻岳口

岳口镇地处要道，经济繁荣，敌人一向用重兵把守这里，是我们巩固扩大天潜苏区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红军主力部队曾两次攻打岳口。

一九三〇年三月，由红六军十六师攻打岳口，守敌川军一个连，弃城逃跑。红军进驻岳口后，又与岳口周围的“红枪会”、“大刀会”等反动会道门武装进行过战斗，随即撤出岳口，返回沔阳文府场，峰口一带。

一九三一年十月再次攻打岳口，岳口的守敌加强了，守敌有四十八师一个营，新三旅一个团，还有常备队七十余人。我军这一次从洪湖分三路向岳口进军：一部分从张港秘密过浮桥，星夜兼程直达岳口；一部分从泽口过河，在仙人桥过一夜；还有一部分在岳口的下游缟布场夜渡岳口。三路部队会师后，由贺龙同志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分析了敌我形势、战役特点。大家认为：总的形势于我有利。敌人虽有一千多人，而且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能统一，战斗力较差。我军士气高昂，战斗力强，步调一致，是统一的队伍。是完全可以打开岳口的。但也分析了不利的因素：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势，又与群众交叉住在一起，如果用炮打，就会损坏民房，牺牲一些无辜群众。用炸药炸碉堡，我们的战士也会付出较大的代价。为了达到既要攻下岳口，又要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提出了用“火牛战术”攻打岳口的方案。贺龙同志点头笑了。

运用“火牛战术”的关键，是要尽快的弄到牛和油。红军在狮子口附近的一家榨坊里，与老板商议，将榨坊里的牛借出来使用，并买了他家的食油。一切战斗准备就绪，黄昏时，牛在前面，红军战士居中，赤卫队员在后面，一起出发，每头牛的两角绑上尖刀。牛尾巴湿透了食油，接近城门时，点燃牛尾巴，火光一亮，尾巴一疼，加上尾后的战士放的放编炮，打的打锣鼓，辟拍声，喊杀声，吓得火牛以排山倒海之势猛向前攻，在睡梦中惊醒的敌人，好象遭到了天降神兵的突然袭击，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有的还没有穿好衣服就当俘虏。我冲锋连迅速占领了陈家巷的大碉堡，后续部队也很快进入岳口，不到两个小时，整个岳口被我红军全部占领。敌人从东北角向汉川方向逃跑了。我军进入岳口后，缴获了敌人丢下的大批武器和食品，解决了洪湖苏区给养的部分困难。后来，在岳口上街的沙窝里搭了浮桥，胜利地回师洪湖。

（熊文、马如海 整理）

皂市米厂与汤池训练班

许子威

许子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任我豫鄂边区行署主席，现任华中农学院院长。

一九三三年，我与李范一一道在汤池办过农场，尔后又在皂市、汤池办过米厂、布厂，其间并与陶铸同志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陶、李二人相继去世。当年同创业、共患难的同志，已寥若晨星。垂暮之年回顾创业的艰难，对今天的“四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谅不无裨益。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督师，五次“围剿”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处于危难之际。同时，国民党当局为稳定民心，在农村大力推行和组织合作社，刺激生产，恰好为我们兴办农场和工厂提供了机会。

我们能办农场，盖工厂，则有赖于李范一的“名望”。李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留学美国，学成归国，遽然戎身于北伐战争，累著功绩。民国时代，历任交通处长、邮政司长、教育厅长，后调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素怀“实业救国”的

抱负。我当时从金陵大学农业系毕业后，处身外地，乡人少有闻问。李范一与我籍同应城，虽是同乡，但从小并不相识，后来通过办工厂，才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我又参加了彭湃同志领导的潮汕战斗。军事斗争失利，南方革命斗争转入低潮。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分散隐蔽”的指示，我于一九三〇年经上海辗转返乡，待时再起。

韶光荏苒，久闲思奋。我通过任本县教育局局长的叔父认识李范一。旋经接触，彼此推诚相与，甚为投契。李范一虽身为当时的“党国大员”，但思想激进，对国民党当局的作为极表不满。他想发挥我一技之长，学以致用，问我有何打算，向我提出了办农场的计划。经过一番筹备，便在汤池办起了有田百亩左右的试验农场。主要任务是培育和推广良种。

两年后，李范一因与国民党的政见不合，毅然辞职回应城，兴致勃勃，想一遂“实业救国”的宏愿，热心于“办工厂，修公路，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便与我商量筹办工厂事。办什么厂？我和李范一殚精竭虑地考察和分析，认为皂市雄居四县要塞，与汤池毗连，历来是稻、米和山货的集散地；汤池温泉又是官商士绅游览疗养所在地。便决定在这里兴办些农副产品加工厂。诸如碾米厂、榨油厂及织布厂等是大有发展前途，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此际适值国民党政府提倡和指导农民大办合作社，我们因时易名地将工厂取名曰：“应城县汤池碾米榨油织布生产合作社。”

筹办工厂首要问题是解决资金。李范一以身示范，一开始就资银洋三千五百元。同时通过动员应城、皂市的资本

家、豪绅老财以及王人、农民、教师入股等方法，又筹积了三千五百元。尔后，我又通过张克明同学的关系，向汉口农业银行取得了五万元贷款。总算解决了资金问题。

厂建于何处，持议难决。经权衡利弊，选在皂市近郊名叫“四顾台”的乱葬岗上，此处原是京山李恶人的放鹰台。北滨临槐河，水陆运输方便，厂建成后，人们习称“皂市米厂”。

米厂的全套机器设备，都是李范一向汉阳周恒顺制造厂购买的。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正式投产。开工的那天厂里召开了庆祝大会。会议选举了理事二十多名。李范一，李伯仁被选为正副理事长。皂市大绅士余运涛挂名任经理，我任副经理。余主要负责处理应、京、天三县复杂的人事关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至二十七年（1938年）是米厂“黄金时代”。经营的品种有谷子、黄豆、齐米、大米等，吞吐量很大。远及河南唐白河，近如彭市河等地，四面八方的大小主顾，终年络绎不绝，厂外河边停泊的船只常达数十艘之多。业务广泛，除厂地的加工生产外，还在汉口开设经销商店，洽谈各方业务。同时，汤池及皂市又附设了书报合作社。通过发行书报，随时掌握市场行情，并隐蔽地做些革命宣传工作。总之，当时厂里的生产、业务是兴旺发达的，收入也逐年增加。诚所谓“物资变精神”，为支援当时应、京、天一带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打下了物资基础。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我华北侵犯。大批爱国知识青年救亡南下，涌进武汉。当时任湖北省农村合

作处处长的石瑛与合作委员会专员李范一商定开办合作训练班，招收一批南下知识青年进行训练，毕业后分发到鄂中一带指导农村合作社。然而建设厅苦于无人担此重任，于是，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面请董必武派员协助。董老欣然同意。石瑛委派李范一为合作训练班主任；董老则推荐陶铸为训练班顾问。一九三七年底合作训练班在汤池正式开学。

开学后，经费困难。陶铸则奔波于汤池和皂市之间，从厂里源源不断地取得大米、食油、布匹及现金以应急需。后因国民党停止对训练班拨款，只开了三期就停办了。接着，我鄂中特委决定改合作训练班为汤池临校，广招知识青年，继续开办，因日寇入侵，汤池临校停办。先后共培训学员六百余名。后来，这批学员中多数都转到豫鄂边区，分赴抗日前线。现任交通部长的潘珙，武大校长庄果，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顾大椿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当时都曾在汤池训练班和汤池临校任教和工作。

厂方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还拿出三千五百元现金，经董老托人从香港购得驳壳枪二十四支。后来我率领的米厂抗日游击大队，就是使用的这批武器。米厂实际上是当时应、京、天三县交界处的革命据点，战斗堡垒。

米厂一直重视群众工作，尽量给四乡农民以方便和支援。每年生产的几十万斤豆饼，均以青苗贷款的方式放给农民做肥料；厂里出售的米、油价格亦比私商便宜。因此引起国民党鹰犬的注意，他们叫嚷“汤池赤化了”，“要消灭赤祸”。派遣特务来皂市窥探。但由于抓不到任何凭据，只好悻悻而去。接着他们以卑劣手段卡住省里拨给我厂的贷款，由于建设厅长刘寿明、财政厅长张难先与李范一的亲密关

系，使其阴谋破产。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工厂被迫停产，将机器设备埋入地下。组成以工人为骨干的抗日游击大队，敌忾同仇，抗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带领抗日游击队在汉川、田二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北上京山，相继编入鄂中特委所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总队。

八年抗战期间，皂市、汤池驻满日、伪军队，工厂内外野草丛生，一片凄凉。抗日胜利后汤池布厂没有了，米厂则迁往汉口。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米厂又迁回了皂市，改名曰：“民丰米厂”。皂市米厂从此获得新生，源源不断为武汉市提供商品粮，为巩固政权尽到力量。

一九八〇年，我和家人回应城、京山探亲，访问阔别四十多年的皂市米厂，看望老战友。现在米厂与当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米厂每天只能加工齐米两万多斤，现在每天能加工稻谷三十多万斤。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面对欣欣向荣的现实，欢欣鼓舞。回首百战创业的战斗历程，令人终生难忘。

《粮食志》办公室 覃定一 刘君耀整理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